

地方志与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群体简论

华桂玲

提 要：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史料不仅集中于各级地方志中的选举志，而且还分散于地理志、职官志、艺文志等其他部分。目前所知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大概4000多人，其中大约67%来自福建。福建地方志是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研究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地方志 特奏名 登第士人 福建

宋代特奏名登科者甚多，然大多数登科者基本信息已佚。所幸地方志中选举志、地理志、职官志、艺文志等版块保存一部分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的史料。从记录特奏名登科士人史料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来看，福建地方志显得尤为重要。

一 宋代特奏名制度、登科者及相关研究概况

特奏名制度是宋代科举制度之一，与正奏名相对。《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所谓特奏名，就是凡解试合格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累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不经解试、省试，即由礼部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登第，并赐出身或官衔的一种科举制度。因为是皇帝特予推恩，故也称‘恩榜’‘恩科’。”^①由于特奏名登科者往往落第次数较多，年龄比较大，故亦有“老榜”之称。

宋代特奏名登科者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人数众多。“据统计和推算，两宋贡举共取士约109950人，其中特奏名者即达50352人，占45.8%。”^②第二，特奏名授官逊于正奏名。以南宋为例：“考入第一等至第四等的特奏名，人数既少，注官难度较北宋更大，考入第五等的特奏名，所授官可谓有名无实。”^③即便是前四等，所授官也大多不过诸州助教等。第三，大部分登科者信息已经无考。《宋登科记考》中录入的有名录可考的特奏名登科者仅仅4380人，还不到登科总数的10%。

特奏名登科士人群体的研究寥寥无几。目前张希清、何忠礼等教授对两宋登科人数进行了统计。《宋登科记考》和《宋代登科总录》以时间为线索搜集整理了两宋登科士人资料，编辑成册。但目前尚未有对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

二 宋代“登科录”中罕见特奏名登科士人史料

“登科录”是研究科举登科士人的重要史料。宋代“登科录”仅《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和《宝祐四年登科录》两榜较为完整保存下来，但所录名录以正奏名为主。

“宋时廷试于榜唱名，谒先圣先师，赴闻喜宴，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具书之，谓之同

^① 张希清：《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16页。

^② 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③ 何忠礼：《南宋科举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年小录。”^①《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以下简称《小录》）是南宋王佐榜进士题名录。“（绍兴）十八年，进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状元王佐，四川进士二十三人。”^②《小录》保留 330 位（该年正奏名共 353 人）^③正奏名登第者的基本信息，而特奏名登科者共 457 人，只有特奏榜首俞舜凯信息记入其中。“是科为绍兴戊辰，南渡后第七科也。所取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其四百五十六人缺，《录》内仅存一人。”^④《小录》中特奏名榜首俞舜凯：“特奏名第一人俞舜凯，字与才，小名桐孙，小字良器。年五十二，十二月十七日生。外氏郭。永感下，第十五。兄弟三人。六举。娶元氏。曾祖文信，故，不仕。祖德名，故，赠通议大夫。父师觉，故，不仕。本贯徽州歙县登瀛乡折桂里。祖为户。”^⑤

绍兴十八年（1148）特奏名登科者信息，《宋登科记考》录入 61 人，《宋代登科总录》录入 67 人。该年特奏名登科者史料的主要来源是各级地方志。

《宝祐四年登科录》是宋文天祥榜进士登科录。宝祐四年（1256）正奏名登科者 601 人^⑥，有 567 人（据该年《登科录》名录统计）被录入其中。是年特奏名登科者 660 人^⑦，榜首袁复元。是榜无一特奏名登科士人录入。宝祐四年特奏名登科者信息，《宋登科记考》录入 137 人，史料的主要来源是各级地方志。

刘埙《隐居通议》所记载《咸淳七年同年小录》，主要记载咸淳七年（1271）正奏登科人数、正奏名一甲前三名名录、特奏名榜首名录。“（咸淳七年）第一甲，共十七人。不能备载，姑且录三魁，可例其余……特奏名第一名吴清伯，附第五甲，建宁府政和县人。”^⑧咸淳七年特奏名登科总数无考，《宋登科记考》录入 10 人。除了特奏名榜首吴清伯信息来自《咸淳七年同年小录》，其余 9 人史料来源主要是地方志史料。

除以上幸存的宋代“登科录”外，《太平治迹统类》卷 28《祖宗科举取人》记有宋太祖开宝六年（973）榜正奏名进士 26 人登科名录（该榜无特奏名），是年诸科只记有人数，其余各榜以记载正奏名登科总人数及状元姓名为主，未见其他详细登科名录。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宋登科记总目》^⑨，以每榜正奏名状元姓名及登科人数为主。

宋代存留下来的《登科录》寥寥无几，幸存的几个也罕见特奏名登科者信息。目前集中记录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资料的主要是地方志选举志。充分利用地方志史料是研究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群体的基础。

^① 佚名：《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448 册，第 345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2《选举考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10 册，第 709 页。

^③ 参见龚延明、祖慧编撰：《宋登科记考》卷 9（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 年，第 781 页）统计该年正奏名 353 人；何忠礼：《两宋登科人数考索·第九表》（《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浙江省社联《探索》增刊，1988 年）记该年正奏名取士 353 人；张希清：《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 5 期，中华书局，1990 年）记该年正奏名取士 353 人。

^④ 佚名：《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48 册，第 345 页。

^⑤ 佚名：《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第 448 册，第 402—403 页。

^⑥ 参见《宋史》卷 44《理宗纪 4》，中华书局，1977 年标点本，第 857 页。

^⑦ 参见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 35，“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中华书局，2016 年，第 2850 页。

^⑧ 刘埙：《隐居通议》卷 3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66 册，第 276 页。

^⑨ 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2，第 704—711 页。

三 地方志是承载特奏名登科士人史料的重要载体

地方志史料的宝贵之处，不只在于方志中的选举志比较集中地记录特奏名登科士人的基本信息，还在于地方志史料的相互补充。这种补充不仅存在于各地、各级、各时期不同版本方志之间，也存在于地方志内部不同版块之间。

（一）选举志集中保留特奏名登科士人史料信息

各地方志中的选举志比较集中地保留了特奏名登科士人的基本信息，且较为翔实，为后人的研究学习提供了宝贵史料。

1. 选举志录入特奏名登科者史料信息的方式

选举志中以文字或表格的形式集中记录特奏名登科士人信息。综合各地方志的选举志，记录特奏名登科士人信息的方式略有不同，主要有文字或图表两种形式。特奏名登科士人信息的记录方式基本上是与正奏名登科士人记录方式相对应的。

第一种是纯文字记录，以时间为序。这种方式又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将特奏名登科信息直接附在正奏名登科者信息后面，并在每一年登科者信息前，或者在登科者名下标注为“特奏名”三个字，与“正奏名”相区别，比较醒目。这样的记录方式有一个弊端，即在流传过程中，存在所标注的“特奏名”三字脱落、遗漏的现象，从而产生与“正奏名”登科士人信息相混淆的结果。进而给相关研究带来了一些困难。另外一种记录方式是将特奏名登科士人信息单独成一个主题，按时间顺序记录，这种方式一目了然，且不易混淆。

第二种是以表格形式记录。福建各级地方志中大多采用这种方式。表格形式要么与正奏名进士一表并列，要么将特奏名登科者信息单独成表。比如光绪《广州府志·选举志》表格以时间为横坐标，以正奏名、特奏名、乡贡为纵坐标分别记录，属于正奏名和特奏名一表并列的形式。^①而民国《台州府志》卷23《选举表》记录的特奏名登科表，是在宋代正奏名进士表后，单独列表。该表以时间为横坐标，以地区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为纵坐标，属于特奏名单独列表的形式。而且民国《台州府志》还把清代一些年老授恩的举人，比附宋代的特奏名制表而记录在案：“乾隆十七年、二十六年，并恩赏会试下第耆老诸生八十岁以上者，给与翰林院检讨职衔，七十以上者给与国子监学正职衔……今取吾台年老举人得邀恩赏者，列诸进士表之后，犹宋特奏名例也。”^②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志资料的记载，才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可贵史料。

史料的记录直接影响着后世的运用。地方志选举志中保留的特奏名登科士人史料，是目前所知的相对比较最集中的。无论是表格形式还是文字形式的记录，都比较方便利用。但在运用的过程中，要注意那些以文字形式记录的，直接附在正奏名登科士人后面的特奏名登科者史料信息的准确性，其中不乏“进士”与“特奏名进士”的混淆。

2. 选举志中所录入的特奏名登科者信息比较翔实

特奏名登科士人资料大多已经不复存在，选举志中录入的特奏名登科者信息非常宝贵。选举志中特奏名登科士人信息内容，包含登科者籍贯、登科时间、字号、家族关系、仕途、主要成就、有无传记等多方面情况。有的还记有方志续修时增入的考证信息，这就更加便于进一步与

^① 参见史澄等纂：光绪《广州府志》卷33《选举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号，第553—563页。

^② 喻长霖等纂修：民国《台州府志》卷23《选举表三》，“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74号，第424页。

“族谱”等资料的核实与利用。

如嘉定《赤城志》：“（本朝，进士，特科下）熙宁九年：夏升，□□人，字□□，终宜兴县尉；求仲弓，黄岩人，字德夫。终知乐清县。有文集藏于家。”^①以上记录的特奏名登科士人信息的基本状况，包括登第时间、籍贯、字、仕途、主要成就等。其中特奏名登科士人夏升的记录信息，虽然一些最初编修进来的登科者信息不慎遗落，但后继者以留空的方式，尽可能地保存初修地方志的本来面目。一方面便于日后查证补缺，另一方面保留地方志史料最原始的面目。

有些地区方志史料几经编修，数次考证，还把一些疑似有误的记录进行标注，以备后人之用。如民国《连江县志》对隆兴元年（1163）特奏名登第士人陈铸卿相关记录便是如此。“陈铸卿，连江人。字仲玉、当孙。县西人，提举。《嘉庆志》^②《通志》^③均误作绍熙元年，采陈氏谱。”^④这是民国《连江县志》编撰过程中参考陈氏族谱而进行的修正，并叙述得清晰，便利后人参考其史料。

地方志的选举志中保存下来的特奏名登科士人相关史料是比较翔实的。这些史料成为宋代特奏名相关研究的基本保障。倘若没有这些基本的史料，特奏名士人研究便很难下手，甚至可以说是无从下手。但是翔实的史料往往是综合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级别地方志中所记内容，进行考证和整理而得。

由于地方志撰写方式往往各有特色，加上历史传承中也有疑似脱漏或误记的现象，因此在史料的运用上需要严谨的考证。不同版本间所记内容的差异，往往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尤其是对于资料相对比较缺乏的特奏名登科士人来说，更要尽可能参考更多。

（二）地方志史料的相互补充

地方志所记特奏名登科士人的信息是多方面的，不单集中于选举志，补充于人物志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信息分散于地理志、职官志、艺文志等其他版块中。另一方面不同级别的地方志所录信息也大大丰富了史料信息。

1. 同一登科士人在各级地方志中所记内容的相互补充

熙宁九年（1076）特奏名登第者求仲弓的基本信息在参考不同级别地方志史料后得到充实。民国《台州府志·文苑传》：“求仲弓，字德夫，黄岩人。熙宁九年特科进士，官终乐清知县。善属文，与王安石为文字交。诗有雅趣，有文集。”^⑤在万历《黄岩县志》中“特科”下简记为：“求仲弓，见《文苑》。”^⑥查万历《黄岩县志·文苑传》中《求仲弓传》曰：“求仲弓，字德夫，日溪人。善属文，熙宁九年特科。与王荆公为文字交，其诗有雅趣。终乐清知县，有文集藏于家。”^⑦

以上几处所记信息来自不同地方的方志史料，将这几处所记史料综合分析，特奏名登第者求仲弓的相关信息就更加具体翔实了。求仲弓为黄岩县日溪村人，这就便利学者进一步明确查找地

^① 陈耆卿撰：嘉定《赤城志》卷34，“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60号，第7324页。

^② 参见李摹修：嘉庆《连江县志》卷8，嘉庆十年（1805）刻本影印本，第6页。

^③ 参见郝玉麟等监修，谢道承等编撰：《福建通志》卷3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9册，第75页。

^④ 曹刚等修，邱景雍等纂：民国《连江县志》卷14，“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76号，第128页。

^⑤ 喻长霖等纂修：民国《台州府志》卷116《人物传十七》，“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74号，第1576页。

^⑥ 袁应祺修，牟汝忠等纂：万历《黄岩县志》卷5，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万历刻本影印，1963年，第8页。

^⑦ 袁应祺修，牟汝忠等纂：万历《黄岩县志》卷6，第15页。

方史料的方向。除了籍贯信息外，据以上材料可知求仲弓文学成就在于善属文，与王安石为文字交，并有文集藏于家。而其《文集》是否有传于世，需要进一步查证史料。

2. 地方志不同版块史料的相互补充

地方志中除了选举志、人物传记中比较全面的记录了特奏名登科士人的基本信息外，还有其他如职官志、地理志、艺文志等版块也有存留下来一些关于特奏名登第士人的宝贵史料。地方志中的地理志虽然是以记录当地的疆域、沿革、山川、形胜等等诸多地理资料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川形胜后附录的一些史料，其中不乏记有一些登第士人留下的诗文，这些也是难得的史料来源。

嘉定《赤城志·山水门》记录求仲弓借蛇首岩以咏志的诗句：“蛇首岩，在县西六十里。旧有石刻‘蛇首岩’三字，故名。（求仲弓诗云：石如蛇首隐林端，未得风雷且蛰蟠。俗眼莫嫌无变化，待生头角始堪观）”^①

嘉定《赤城志·山水门》记录求仲弓借灵龟潭以咏志的诗句：“灵龟潭，在（黄岩）县西六十五里。（求仲弓诗云：江潮虽阔多罾网，幽涧清虚且勉旃。待我功成买双鹤，归来伴汝一千年）”^②

嘉定《赤城志·山水门》记录求仲弓借灵龟潭、蛇首岩咏志的诗句，求仲弓善诗文，这两首借助家乡景物而咏志的诗句被流传下来。虽然求仲弓《文集》是否流传于世，还需进一步的考证，但通过地方志，我们最起码还能欣赏其中的两首。这两首也是研究特奏名登第士人求仲弓不可或缺的史料。

地方志中地理志的“坊市”版块下也记有为一些为特奏名榜首所立“状元坊”的信息。如林石，字显良，生卒年不详，福州福清人。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丙戌科恩科（即特奏）榜首。《八闽通志》卷14“福清县坊市”记载：“状元坊，宋时为林良显特魁立”^③；“罗源县坊市”记载：“魁星坊，宋时为特科第一人陈缜立（在县西南后张巷，今罗源凤山公园附近）”。^④这些“状元坊”，有的至今尚存，是当年历史见证，是史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有的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不存在了，但幸运的是，在地方志中的相关记录还能让我们了解一二。

地方志的职官志中保留了一些在当地任职者的基本信息，包括籍贯、登第状况、所任官职，其中不乏特奏名登第者。光绪《海阳县志》在“职官表”之“宋：令、主簿”下记有：“林洵美，福建莆田人，进士。”^⑤经考证，林洵美为绍兴十五年（1145）特奏名进士第一人。乾隆《莆田县志》：“（特奏名，绍兴十五年乙丑）林洵美，第一人，特赐同进士出身，知潮阳县。”^⑥充分利用方志中的职官志是进一步了解和研究特奏名登第士人仕途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特奏名登科者信息，在各地方志选举志中记载直接、集中，使用起来相对比较便利。地理志、职官志、艺文志等版块中相对比较分散，不方便查找和利用，一些史料还未被发现和利用。地方志对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的史料价值还没有充分体现。因此，充分利用地方志史料，挖掘更多的宋代特奏名登科者史料信息，将是未来特奏名登科士人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环，也将推动宋代科举乃至整个古代科举制度的更进一步研究。

^① 陈耆卿撰：嘉定《赤城志》卷20，“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60号，第7221页。

^② 陈耆卿撰：嘉定《赤城志》卷24，“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60号，第7247页。

^③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14，“福建地方志丛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2页。

^④ 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14，第264页。

^⑤ 卢蔚猷修，吴道镕纂：光绪《海阳县志》卷9，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72页。

^⑥ 汪大经等修，廖必琦等纂：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12，民国十五年（1926）重印本，第29页。

四 福建地方志在特奏名登科士人相关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地方志是特奏名登科士人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而福建地方志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福建地方志，一方面保留特奏名登科士人名录史料最多，另一方面保留特奏名登科士人的相关史料较为全面，甚至弥补其他史料的空白。

(一) 福建地方志保留特奏名登士人数量最多

现存特奏名登第士人名录大部分都来自福建，这是就《宋登科记考》中所辑录的特奏名登科士人名单进行统计后得出的结论。统计结果以表格形式体现。表格以宋代特奏名开榜时间为序，统计各榜登科总人数（目前有确切数字记载的便如实录入，没有确切数字记载的记为“若干”）、《宋登科记考》中所录入现存每榜特奏名登科士人人数，以及福建路籍各榜人数。统计结果如下表：

表1 特奏名各榜登第人数、《宋登科记考》录入人数及福建路特奏名登科士人总数统计表①

序号	开榜时间	各榜登第总人数	《宋登科记》录入人数	福建路登科人数
1	开宝三年（970）	106	1	0
2	太平兴国二年（977）	184	0	0
3	雍熙二年（985）	84	0	0
4	咸平三年（1000）	236	1	0
5	景德二年（1005）	315	8	2
6	大中祥符八年（1015）	78	1	0
7	天禧三年（1019）	若干	4	3
8	天禧四年（1020）	161	4	0
9	天圣二年（1024）	43	3	2
10	天圣五年（1027）	109	8	7
11	天圣八年（1030）	若干	1	0
12	景祐元年（1034）	857	8	6
13	宝元元年（1038）	397	10	6
14	庆历二年（1042）	332	8	4
15	庆历六年（1046）	223	9	2
16	皇祐元年（1049）	若干	1	0

① 根据傅璇琮主编《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中各榜特奏名登科人数及福建路籍名录统计所制。

(续表)

序号	开榜时间	各榜登第总人数	《宋登科记》录入人数	福建路登科人数
17	皇祐五年（1053）	75	10	5
18	嘉祐二年（1057）	122	12	7
19	嘉祐四年（1059）	29	6	0
20	嘉祐六年（1061）	43	3	0
21	嘉祐八年（1063）	72	5	3
22	治平二年（1065）	45	4	1
23	治平四年（1067）	若干	12	3
24	熙宁三年（1070）	474	9	4
25	熙宁六年（1073）	475	25	17
26	熙宁九年（1076）	447	17	7
27	元丰二年（1079）	778	31	20
28	元丰五年（1082）	836	37	31
29	元丰八年（1085）	847	49	36
30	元祐三年（1088）	若干	29	22
31	元祐六年（1091）	若干	22	14
32	绍圣元年（1094）	若干	20	16
33	绍圣四年（1097）	若干	24	12
34	元符三年（1100）	若干	27	21
35	崇宁二年（1103）	若干	27	20
36	崇宁五年（1106）	若干	28	13
37	大观三年（1109）	若干	52	37
38	政和二年（1112）	若干	58	49
39	政和五年（1115）	若干	66	48
40	重和元年（1118）	若干	38	30
41	宣和三年（1121）	317	40	31
42	宣和六年（1124）	若干	43	23
43	建炎二年（1128）	若干	54	34
44	绍兴二年（1132）	158	69	52
45	绍兴五年（1135）	272	52	33

(续表)

序号	开榜时间	各榜登第总人数	《宋登科记》录入人数	福建路登科人数
46	绍兴八年（1138）	若干	85	59
47	绍兴十二年（1142）	514	80	63
48	绍兴十五年（1145）	247	70	54
49	绍兴十八年（1148）	457	61	38
50	绍兴二十一年（1151）	531	61	43
51	绍兴二十四年（1154）	434	59	45
52	绍兴二十七年（1157）	392	54	42
53	绍兴三十年（1160）	513	81	58
54	隆兴元年（1163）	277	128	99
55	乾道二年（1166）	295	69	41
56	乾道五年（1169）	291	44	28
57	乾道八年（1172）	481	68	58
58	淳熙二年（1175）	587	92	61
59	淳熙五年（1178）	若干	64	49
60	淳熙八年（1181）	470	49	31
61	淳熙十一年（1184）	699	65	43
62	淳熙十四年（1187）	714	75	44
63	绍熙元年（1190）	750	172	135
64	绍熙四年（1193）	473	53	41
65	庆元二年（1196）	578	96	67
66	庆元五年（1199）	789	135	91
67	嘉泰二年（1202）	497	78	50
68	开禧元年（1205）	611	76	54
69	嘉定元年（1208）	641	71	45
70	嘉定四年（1211）	697	83	65
71	嘉定七年（1214）	669	74	44
72	嘉定十年（1217）	663	79	49
73	嘉定十三年（1220）	647	78	38
74	嘉定十六年（1223）	679	105	55

(续表)

序号	开榜时间	各榜登第总人数	《宋登科记》录入人数	福建路登科人数
75	宝庆二年(1226)	若干	63	35
76	绍定二年(1229)	1121	155	111
77	绍定五年(1232)	592	103	79
78	端平二年(1235)	657	97	75
79	嘉熙二年(1238)	640	125	88
80	淳祐元年(1241)	637	64	48
81	淳祐四年(1244)	621	35	21
82	淳祐七年(1247)	750	61	42
83	淳祐十年(1250)	615	70	57
84	宝祐元年(1253)	若干	65	47
85	宝祐四年(1256)	660	137	46
86	开庆元年(1259)	309	45	25
87	景定三年(1262)	743	32	19
88	咸淳元年(1265)	若干	21	5
89	咸淳四年(1268)	若干	32	8
90	咸淳七年(1271)	若干	10	3
91	咸淳十年(1274)	若干	24	3
两宋特奏名登第人数总计		不计	4380	2923

如上表可知，虽然两宋特奏名登科士人人数众多，但现存有名录者甚少，目前在《宋登科记考》中所录入的总数仅有4380人。这些特奏名登科士人的资料来源，绝大部分是地方志。比较其中两组数字会发现，其中2923人来自福建，大约占所录人数的67%，其他地方总计才占约33%。从数量上可见福建地方志在特奏名登第士人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了。

(二) 福建地方志保存特奏名登科士人史料相对比较完整

福建省、州、县等不同级别地方志记载特奏名登科情况都比较翔实，有的还弥补了其他史料的不足。就目前《宋登科记考》《宋代登科总录》所录入的特奏名登科士人信息进行统计，91榜特奏名榜首中已知姓名者为74位。但笔者在查找和研究福建各地方志的过程中，惊喜地发现了第75位特奏名榜首信息，这是宋代特奏名登科士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这要归功于嘉靖《邵武府志》。

嘉靖《邵武府志》填补目前学界所掌握的史料的空白。地方志史料记录登科者信息时，往往也会录入各榜的状元姓名。但比较罕见的是嘉靖《邵武府志》不单记录了正奏名进士状元姓

名，还记有特奏名进士榜首姓名，以及释褐榜榜首姓名。淳祐十年的特奏名榜首张一清，《宋登科记考》中没有收录其信息。在《宋代登科总录》中，利用了两则材料证实张一清为榜首的史实，其中一则就是嘉靖《邵武府志》。更令人惊喜的是，目前尚属于研究空白的淳熙五年特奏名榜首的信息也保留在嘉靖《邵武府志》中。在该年邵武登特奏名进士第的上官贵和上官伯忠的右上方标注“赵点榜”。通过考察，所录特奏名榜首梅瑛、黄硕、刘鼎、谢藻、石继喻、陈珏、李大同、魏汝贤等信息都与史实相符，因此嘉靖《邵武府志》所录“赵点榜”史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样使目前所掌握的特奏名榜首姓名信息的人数增加到了75位，只有16位信息不明。

五年	二年	八年	五年	二年
黄瑛 人光澤	任希夷 入邵武	赵善衡 入邵武	陈禹 入邵武	上官惠 入邵武
	赵善衡 入邵武	赵善衡 入邵武		上官惠 入邵武
			上官泰 入邵武	上官金 入邵武
上官伯忠 入邵武	上官貴 入邵武			

图1 嘉靖《邵武府志》截图^①

结 论

虽然目前宋代特奏名士人群体研究成果微乎其微，但随着学界的关注和研究的深入，终将可以让现代人了解特奏名士人群体的精神面貌，这势必会推动宋代特奏名制度以及宋代科举研究的深入发展。

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地方志是特奏名登科士人群体相关研究的基础史料，而福建地方志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之一。地方志中所含历史信息丰富而庞杂，很多历史信息急待学界的整理与研究。

以上是笔者在查找和整理地方志史料过程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地方志内容丰富，还有很多尚未被发现的史料正等待学者们的慧眼识珠，从而让那些幸存于世的史料发挥其真正的价值。中国古代的地方志，也给今天史志的编写提供了可参考的蓝本。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参见陈让撰：嘉靖《邵武府志》卷8，“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第6页。